

珠海市社区治理中的 党建创新: 经验与启示*

赵华安**

【摘要】珠海市近年来在结合社区治理的党建创新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探索。考察珠海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工作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新”组织的发展、人员流动的庞大和频繁、“香港经验”的借鉴。为此珠海市所进行的党建制度创新主要有：党群工作一体化工作模式、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坚持社区“大党建”模式、培育社区认同意识、把握网络党建的趋势。

【关键词】珠海 社区治理 党的建设 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① 这充分说明了基层党建的重要意义。当前，如何将党的建设融入社区治理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基层党

* 本文系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珠海市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创新研究”（立项编号：2015YB089）的研究成果。

** 赵华安，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珠海市近年来在结合社区治理所进行的党建工作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新认识、新方法和新举措，总结其中的新经验，提取其中有价值的新观点和新思路，可以为我们当前进行的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 珠海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工作的影响因素

党的建设必须实事求是，社区治理工作需要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社区转型，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社区治理模式，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区党建模式。我们探讨珠海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创新问题时，需要首先厘清那些前提性的、存在于珠海地域的、带有特殊影响的因素。

(一) “两新”组织的发展

作为特区的珠海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地，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两新”组织。“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各类非营利性的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两新”组织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与政府的关联性较弱，区别于国有或集体单位与政府的强关联性。“两新”组织在珠海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表1 珠海市新经济组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和从业人员年末数占比

单位: %

项 目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			从业人员年末数占比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外商投资企业	34.3	30.6	28.8	15.7	15.7	14.3
港澳台投资企业	22.1	18.5	16.8	16.8	17.2	15.0
私营企业	7.8	7.8	8.5	14.0	13.1	13.6
个体经济	—	—	—	12.2	12.2	13.2
合计	64.2	56.9	54.1	58.7	58.2	56.1

资料来源 《珠海统计年鉴》(2016年、2017年)。

表2 珠海市社会组织和注册志愿者数量

年 份	社会组织		注册志愿者	
	数量(个)	增长率(%)	数量(万人)	人均参与志愿服务时数(小时)
2014	1711	20.3	27.0	21.8
2015	1916	12.0	30.5	62.79
2016	2104	9.8	31.2	62

资料来源 《珠海统计年鉴》(2015年、2016年、2017年)。

从表1可知,无论是所创造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还是吸纳的就业人数,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这充分说明了新经济组织在珠海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表2则向我们展示了近年来珠海市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长,群众基础逐步扩大的现实情况。

“两新”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广泛存在,给珠海市的社区治理以及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社区治理不应狭义地被界定为服务居民日常生活,多元化的主体和多种类型的社会活动渗透到社区的日常中,要求社区治理从居民和单位拓展至市民和社会的范围。就珠海而言,“一大批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多元的载体,多元的需要”^①的现实状况,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有着与国有、集体单位不一样的情况。“两新”组织党员存在“少、低、频”的特点,即党员人数少、所占比例低、流动较为频繁。^②在“两新”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有着种种困难,从企业层面来讲,不少外商投资者对党建工作带有一定的“戒备”甚至“偏见”心理,担心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不少员工抱着“打工者”的心态,担心被“炒鱿鱼”,不积极入党,或者已是党员的也没有亮明党员身份、不参加组织生活、不登记也不转移

① 刘可英 《创新制度 共铸和谐 珠海市香洲区成功破解新形势下社区党建难题》,《南方日报》2007年5月21日,第A06版。

② 张明明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10期,第45页。

组织关系等。^①

“两新”组织给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带来的新问题，不应被视作互不相关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在整合问题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以党的建设为纽带，将“两新”组织的力量及其积极性投入到社区治理中，实现社区与“两新”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二) 人员流动数量大、频次高

作为特区的珠海是对外开放和交流的门户，加之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因此人员流动数量大、频次高。

表3 珠海市年末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

单位：万人

年 份	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全市年末户籍人口	差额
2014	161.42	110.22	51.20
2015	163.41	112.45	50.96
2016	167.53	114.78	52.75

资料来源 《珠海统计年鉴》(2017年)。

表4 珠海市口岸出入境和接待境外过夜旅游人数

单位：万人

项 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口岸出入境人数	11893	13329	13645
接待境外过夜旅游人数	291.34	309.52	317.23

资料来源 《珠海统计年鉴》(2015年、2016年、2017年)。

从表3可知，2014年、2015年、2016年这三年中珠海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额均超过50万人，约占户籍人口的1/2，常住人口的1/3，在当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制下，这些作为外来人员的非户籍人口流动性较大，给居住地社区的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比如，

^① 中共珠海市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调研组 《关于“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调查与思考》，《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24页。

社区居住人员统计一般以户为单位,但原户主可能已迁出却将房屋出租,或者租住人员变动却未及时登记等,造成社区在册居民人数及人员与实际不符,难以开展工作。

从表4可知,珠海作为边境口岸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员出入境内外,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年的出入境人数都超过了本市户籍人数100倍,而所接待的境外过夜旅游人数比整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还要多。大量且频繁的出入境人口流动带来的是信息交流的便利广泛,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冲击与碰撞,这给社区的治理和党建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综合表3和表4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大量的流动人员中不乏港澳台人士的身影,尤其是珠海与澳门比邻,很多澳门居民在珠海购房居住,融入了珠海的社区。这些港澳台居民与内地居民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一方面的社区治理与党建工作,是一个新的课题。

(三) “香港经验”的借鉴

作为特区的珠海是学习先进地区发展经验的窗口,加之临近港澳,一些先发展地区先进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和手段被引进珠海,尤其是香港经验在珠海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经常被作为经验和参照。比如,有学者认为要“学习香港经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形成社会‘善治’格局”。^①比如,就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养而言,有人认为“从珠海市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情况与香港等外来地区的发展模式和职业成熟度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积极借鉴香港对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的发展环境和基本经验”。^②在提倡积极借鉴和学习的同时,一些实践环节也参照了香港经验加以实施,比如珠海市邻里互助社的成立。2010年9月,经珠海市民政局建议,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街道办作为发起人,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邻舍辅导会共同成立珠海市邻里互助社,该社参照香港邻舍辅导会的运作模

^①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珠海政府治理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68~69页。

^② 本书编写组 《创新社会管理的“珠海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128页。

式,实行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非营利性社会服务。^①

作为先发展地区,香港在社区治理的很多方面确实成熟高效,“可以给内地很多的启示和借鉴”,但是“由于香港和内地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域面积等差异,香港的体制模式具体的做法不一定适合内地的情况”^②,尤其是社区治理中党的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研究社区建设如果看不到以党建带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③。

二 珠海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

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因此,抓好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工作,关键是要在制度上改革和创新。珠海市历来重视党建工作,近年来在结合社区治理的党建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探索出了诸如党群工作一体化工作模式、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

(一) 党群工作一体化工作模式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基层党建新领域。”^⑤“两新”组织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城市里,作为珠海市主城区的香洲区就“聚集了珠海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

① 本书编写组《创新社会管理的“珠海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78~80页。

②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珠海政府治理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67页。

③ 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7期,第6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3页。

⑤ 甄欣《珠海特区基层党建科学化的探索和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36页。

员”^①。面对这一新情况,珠海市探索建立了党群工作一体化的党建工作新模式。党群工作一体化是一种强调党组织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实现党的工作与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工作的共建共促、融合创新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的制度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运作机制。

首先,是创新“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体制。珠海市分别在2001年和2009年成立了专职机构,分别负责统筹和指导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2012年11月,“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部门分开,领导机构单独设立。“中共珠海市委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珠海市委新经济组织委员会”,负责全市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中共珠海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珠海市新社会组织委员会”,负责全市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②领导体制的改革,设置专业职能部门进行分工建设,有利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高效开展。

其次,在具体运作机制上,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合+三分”的工作原则与“四共建+四沟通”的工作方法。

第一,“三合+三分”的工作原则。党群工作一体化要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有效合作,珠海市的做法是实现两者在机构上对应设置、人员上交叉任职、工作上协调推进,在此基础上实行工作上的“三合”,即工作规划合起来,工作部署合起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合为一体。但党组织毕竟不能替代群团组织,于是就有了工作上的“三分”,即组织生活、组织发展、人员管理和业务指导的分开进行。

第二,“四共建+四沟通”的工作方法。“四共建”是指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在组织、队伍、阵地和活动上的共同建设、共同开展。“四沟通”是指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四个方面,及时有效地与非公单位负责人沟通,以取得非公单

① 刘可英《创新制度 共铸和谐 珠海市香洲区成功破解新形势下社区党建难题》,《南方日报》2007年5月21日,第A06版。

② 珠海市新社会组织党委《社会组织党建创新工作中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组织》2015年第19期,第45页。

位对党建工作的认可与支持。^①

党群工作一体化的新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覆盖和开展问题，实现党建资源的优势组织和互补互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给予高度评价：“珠海在新经济组织中实行‘党群工作一体化’的党建模式带有方向性”“珠海市加强非公党建工作的经验很好，应总结推广。”^②

(二) 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

社区治理中往往会遇到议事难，或者是拍脑袋决策，又或者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决策难和执行难的“双难”困境。珠海市的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③就是力图破解这一困境的制度创新。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不仅仅是一个议事机构，还是有效整合决策与执行两个环节的一项制度安排，其基本架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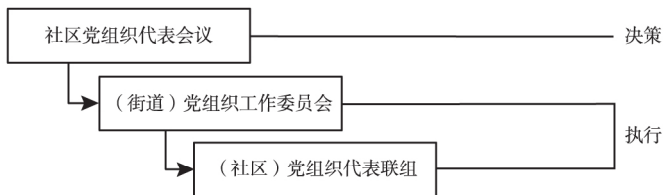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架构

第一，在决策层面上，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是社区内最重要的议事平台，由社区内各单位的党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会议。区别于临时性的议事机构，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着力于规范化建设：制订会议自身的章程以保证有效运作，召开定期会议（每年一次、五年一届）以统筹社区工作，选举产生工作委员会以落实会议决议。这些举措保证了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在

① 胡细莺 《探索党建品牌 创造珠海范本 我市“两新”组织党的工作100%覆盖》，《珠海特区报》2012年8月8日，第1版。

② 甄欣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珠海市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与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6页。

③ 甄欣 《珠海特区基层党建科学化的探索和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36页。

社区治理中的权威性。

第二,在执行层面上,区分为街道和社区两个层级。街道的党组织工作委员会起领导和统筹作用,一方面将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转化为具体的工作举措,以指导和监督社区党组织代表联组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则要动员和协调社区内各种资源以协助社区党组织代表联组完成工作。而社区党组织代表联组就是具体落实相关工作的基层组织。

珠海市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明确的分工实现效率;二是以党组织为纽带实现各个环节和部分的有效整合,从而为社区各成员单位党组织的交流合作提供载体和平台,有利于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开展社区建设。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从2003年10月在珠海市香洲区狮山街道进行试点工作,迅速在全市社区推广铺开,2003年到2011年间,全市171个城市社区,就已经“有104个社区建立了党建工作联席会等协调议事机构,有123个社区建立了党员服务中心(机构)”^①。

(三) “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

在社区治理的进程中,党组织不可能事事包办,这样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关键还是要靠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所以有必要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是这种民主自治并非是一种去中心的、无方向的制度安排,党组织是整个民主自治机制的核心,发挥着引导方向的作用。遵循这样的原则,珠海市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新机制。^②

“五个构建”,即构建政社分离与政社互动机制,构建社区“五主”民主自治新机制,构建社区“五位一体”的工作平台,构建社区民主自治运行机制,构建社区党组织覆盖机制。^③“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是

① 付洪军、朱组轩 《特区固堡垒 党旗竞风流 珠海市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纪实》,《珠海特区报》2011年6月30日,第10版。

② 本书编写组 《创新社会管理的“珠海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18~22页。

③ “五主”民主自治新机制是指强化党政主导、突出社会主体、抓好主业工作、发挥主力作用、体现主人地位 “五位一体”的工作平台包括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综治信访维稳平台、群团组织工作重心下沉平台、社区社会组织 NGO 服务平台和社区网络问政平台。

以社区自治为核心，涉及居民和政府两个层面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通过培育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民主机制来实现社区治理；另一方面是规范界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政府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以实现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而连接政府与居民的中介就是党组织，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是内嵌入居民民主自治机制中的。“五个构建”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有两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是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为此有两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一是建立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居民小组的三级社区网络，实现了“有人主事、有人议事”的运作方式。二是建立了“议事—决策—执行—协助—监督”五环节的运作程序，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先由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讨论，交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拍板决定，之后是社区居委会执行，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协助，最后则是社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察评估。

第二是强调党的领导。为此做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建立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三级党组织网络，做到了社区、楼栋、居民身边都有党员，实现了党组织的全覆盖。二是建立了社区党（总）支、居委会、公共服务站“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三个机构合署办公，人员交叉任职，以更好地服务社区。三是建立“居民议事厅”，这是由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三方共同参与沟通的平台，开创了物业服务、居民自治、党的监督“三方共管”的社区治理模式。四是社区党员的“双隶属”管理，实行党员的工作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的双重隶属管理模式，引导和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和社区自治活动，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中。

三 珠海市社区治理中党建工作的经验启示

珠海市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社区治理中所进行的党建创新探索，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富有价值的启示。

（一）坚持社区“大党建”模式

社区“大党建”是指通过城市区党委、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社区党

(总)支(工委)在充分整合街居党组织资源的基础上,以区域党建推动街居治理创新的党建新模式。^①换言之,社区“大党建”模式是以街道(社区)党工委为核心,整合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各种产业链、新兴社会组织,乃至党员个人在内的党建资源,在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的同时,有效地动员社区党建资源推动社区治理。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珠海市在社区治理中党建工作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是一个逻辑关联极强的内在扩展机制,构成了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同心圆,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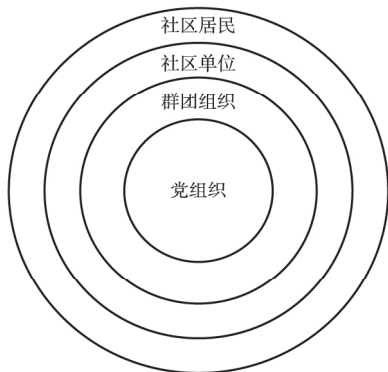


图2 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同心圆

党组织是整个机制的核心,通过党群一体化工作模式整合了第一层次的群团组织;通过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整合了第二层次的社区各单位;通过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整合了第三层次的社区居民,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社区治理。

社区“大党建”模式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党组织的覆盖和动员,即党组织在社区层面的有效覆盖和党组织调动资源服务社区的能力。结合珠海市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工作实践,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就覆盖而言,真正实现有效的覆盖,应该从注重量的多少到注重质的提升。过去讲社区党组织的覆盖程度,一般是以百分比表示,追求百分之百的覆盖率,但带来的问题是党组织建立了,能否开展工作,工作

^① 史云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的成效如何,则不在考虑的范围。注重质的提升就是要强调“以人为本”的覆盖,让党组织扎根社区,处处都有党组织的身影,让社区居民人人都能找到党组织,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第二,就动员而言,扁平化组织体系是当前社区治理结构采用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组织结构适应了社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现实要求,强调互不隶属的社区单位(个人)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党组织工作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在坚持领导地位的同时对领导方式做出适当的调适,从过往强调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动员转变为强调组织动员和行动影响。社区党组织作为平等参与社区治理的一员,其领导方式是通过规则制定、平台建构、议程设置、利益协调、互动引导来实现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社区各单位和个人的力量及积极性参与社区治理。

(二) 培育社区认同意识

社区需要一种集体认同意识来维系和推动发展。社区的集体认同有助于破除陌生人社会造成的心理区隔,能够提升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和凝聚力;社区的集体认同有助于将居民从自扫门前雪的个体心态提升至共建美好家园的共同体认识和行动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区认同是实现社区治理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社区党建工作应该融入社区认同的形成过程,社区党组织推动社区认同的形成,实质上就是实现党的领导权威深入社区,实现权威的外在化转变为内在化,由外在的强制到社区居民自发认可的过程。

结合珠海市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工作实践,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从“文化乐民”到“文化育民”的提升。人们一般都认为社区文化活动就是给社区居民找乐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注重投放各种资源搞好社区的文化设施和文娱活动,兴建社区文化活动室、图书馆、运动设施,组织合唱团、舞蹈队,办好节庆假日晚会等。诚然,这些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在工作重心上过分偏重于文化活动的消遣功能而忽略了其导向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提升社区党建工作水平,应该注重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引

导。在这一点上,珠海“社区党员论坛”的做法有参考价值。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道党工委组织的“社区党员论坛”是一个为社区居民和党员干部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每期都能吸引很多社区居民参与。在论坛现场,社区居民、受邀专家、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就社区公共事务话题同台交流讨论,通过居民提问、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解答、专家点评的形式,既实现了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有效传播,又有利于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公共精神的形成。“社区党员论坛”得到广东省委、珠海市委的充分肯定,被列入《广东党员电教(城市版)》向全省推广。^①

第二,从党内民主到社区民主的实践。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是形成社区认同的制度基础,只有让居民亲自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才能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在目前社区参与度普遍不高,社区自组织能力还较弱的情况下”,社区建设需要依靠一种权威性组织来推动,“它不仅要创建社区自组织体,还要帮助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将这一‘自组织的组织’称为‘元治理体’,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就类似于‘元治理体’”。^②因此,社区民主自治机制的建设需要党的组织和引导,实践证明,从党内民主到社区民主的道路是正确可行的。珠海的做法是实行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与社区民主自治机制相结合,通过整合社区内部党建资源引领社区治理,并且将党的组织领导和功能融入社区民主自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培养社区集体参与和管理的共同体意识。

(三) 把握社区网络党建趋势

迅猛发展的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给社区治理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社区的党建工作带来了挑战,把握社区党建的网络化趋势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珠海市的一些做法有启示意义,例如提出“网络化党组织的构想”,针对一些社区

^① 刘可英 《创新制度 共铸和谐 珠海市香洲区成功破解新形势下社区党建难题》,《南方日报》2007年5月21日,第A06版。

^② 孙肖远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理论导刊》2012年第6期,第51页。

新兴社会组织规模小、组织灵活、工作场地和服务对象不固定、人员流动频繁等特点,珠海市新社会组织党委提出可以尝试“突破传统的党组织‘实体化’的设置方式,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尝试组建设没有固定的地理空间、没有时间限制,通过党员的信念和高度自律形成的非实体化党组织(或者称为网络化党组织)”。^①又如翠香街道推行的“社区民主+网络平台”的工作形式,通过开通社区网,将居民(代表)会议和社区协商议事会搬上网络平台,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网络讨论,形成解决方案;并且将网上民意测评结果作为居委会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实现社区民主监督的网络化。^②当前开展社区网络党建工作,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要善于利用技术优势整合社区党建信息。“网格化+大数据”是社区网络党建信息处理工作应该善于利用的技术手段。将社区的基本信息,如自然环境、商业交通等,以及社区党员和居民的个人资料,如年龄、职业、教育状况、家庭组成等以网格为单位录入后台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技术处理,形成社区党员和居民的生活偏好、行为取向等分析模型,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掌握社区动态,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第二,要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社区党建工作。智能移动网络平台是社区网络党建工作应该善于利用的技术工具。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移动网络平台成为可能,这进一步突破了时空的物理界限,具备了时时在场、瞬时发布的功能。因此应该将社区网络政民互动平台和党建工作平台从固定网页界面转移至基于智能手机应用的微信公众号、群组、APP、网络直播平台上,实现社区网络党建工作的日常化和身边化。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珠海政府治理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① 珠海市新社会组织党委《社会组织党建创新工作中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组织》2015年第19期,第44页。

② 本书编写组《创新社会管理的“珠海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152~153页。

社, 2012。

本书编写组 《创新社会管理的“珠海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甄欣 《珠海特区基层党建科学化的探索和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甄欣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珠海市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与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刘可英 《创新制度 共铸和谐 珠海市香洲区成功破解新形势下社区党建难题》，《南方日报》2007年5月21日，第A06版。

张明明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10期。

中共珠海市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调研组 《关于“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调查与思考》，《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珠海市新社会组织党委 《社会组织党建创新工作中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组织》2015年第19期。

郑杭生 《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7期。

胡细莺 《探索党建品牌 创造珠海范本 我市“两新”组织党的工作100%覆盖》，《珠海特区报》2012年8月8日，第1版。

付洪军、朱组轩 《特区固堡垒 党旗竞风流 珠海市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纪实》，《珠海特区报》2011年6月30日，第10版。

史云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孙肖远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理论导刊》2012年第6期。

Party Building Innov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Zhuhai City: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Zhao Hua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Zhuhai City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ffective explorations in terms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nov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Zhuhai city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new social organization , the huge and frequent mobility of people , and borrowing the experience from Hong Kong. The innovations of the Party building system carried out in Zhuhai City mainly in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k mode of the Party and mass work , the conference system of community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 and the community democratic autonomy mechanism of the “five constructions”. Hence , the inspirations from the practice are adhering to the “big Party building” model in the community , cultiv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awareness and making better use of Internet in the Party building.

Keywords: Zhuhai; Community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